



胡耀邦 (1915 1989)



1978 年 12 月，胡耀邦（前左一）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1982 年 11 月 30 日，在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胡耀邦與鄧小平親切交談。



1982 年 11 月在中共福建省委，胡耀邦（右）滿懷激情地問省委第一書記項南：
福建能不能走在全國四化建設的前頭？



江西共青墾殖場建場 30 年來，始終受到黨中央的關懷。1955 年 10 月，胡耀邦同志受黨中央委託，到這裡看望第一批墾荒者，用小山竹夾著棉花當筆，為他們寫下了“共青社”三個大字；1978 年，胡耀邦同志為他們題寫了“共青墾殖場”場名；1984 年 12 月，胡耀邦同志又一次到這裡考察，並題寫了“共青城”三個大字。

（新華社記者游雲谷攝）



1987 年 12 月 26 日，胡耀邦在會計司胡同家中。



1989 年 3 月 23 日，胡耀邦在北京家中。



1989 年 4 月 4 日，胡耀邦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秦基偉（右）、李瑞環（左）在第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式上。

目 錄

新版序	18
修訂版序	19
修訂版文前絮語	20
初版序	23
初版文前短語	25

第一部分

第 1 章 一次大解救	28
“全國究竟有多少‘右派’？”	28
“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	32
這一次大解救，就使數百萬人脫離苦海	37
“我向陳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41
第 2 章 歷史轉折的謀略.....	44
“文革”磨難	44
“中興偉業，人心為上！”	48
“毛主席為甚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54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58
第 3 章 中組部起狂飆	59
郭玉峰在中組部的作為	59
鬥爭由大字報轉上了《人民日報》	62
果然不久，郭玉峰就離開了中組部大院	64

第4章 重振‘黨員之家’67

一句話、兩個要求和一個大動作	67
“對夏衍，楚圖南……這樣的老同志，怎麼能誣稱他們為‘社會糟粕’呢？！”	69
“我一定向耀邦同志彙報，請你放心！”	71
耀邦在自家接待了申訴沉冤的惲逸群和秦川	72
“對找我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	76
應該主動地找老同志們談談心	80

第5章 奮起決戰的外圍戰..... 83

“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83
“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永遠不能設有任何‘禁區’！”	88
“人能活一萬歲嗎？這種口號很不科學嘛！”	89
震撼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一）	92
震撼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二）	96
討論更上一層樓	104

第6章 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109

重大突破口：“六十一人案”	109
1975年鄧小平就說過：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	113
了得不得了，先打開一個小小突破口	114
擴大突破口時的激烈較量	118
另起爐灶，兵貴神速	124
中南海裡的短兵相接	129
“兩個凡是”的主陣地終於被突破	132

第7章 撥亂反正鼓聲急.....135

彭德懷、陶鑄與“六十一人案”同時平反	135
1976年的“四五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	138

平反冤假錯案的滾滾春雷響徹四方	142
黨內黨外的新老錯案齊解決	147
文化、統戰、工會方面紛紛落實政策	151
“文革”中被錯判的十八萬四千多名“反革命”被平反或改正	155
為大批“地富反壞”摘帽	159
劉少奇，壓根兒就不是“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	160
只可惜：在陽光普照大地時，也還有不易消融的冰川凍雪	161

第二部分

第 8 章 為“惡攻英明領袖華主席”死難者昭雪..... 170

從監獄悄悄傳出的掛號信	170
勤於獨立思考的女青年	171
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173
矛盾進一步激化，她成了“惡攻”分子	176
省委常委中的明智之士奮起抗爭，但他們屈居少數，未能挽回狂瀾	178
撥亂反正的鼓聲，很難影響到這個角落	180
地委書記杜昭說：“記者的屁股坐在甚麼地方？”	183
胡耀邦的批示，才掀開了這裡的大鐵蓋兒	185
然而人們：還得警惕啊	187

第 9 章 葛佩琦的“鐵案”是這樣翻過來的..... 189

先說說這位革命長者	189
他本是熱血滿腔的愛國青年	192
“一二·九運動闖將”	194
“民先”“民先”更得打先鋒	196
步步走向奉獻終身的大門	200
身在“曹營”心在“漢”；萬死而不辭（上）	204

身在“曹營”心在“漢”，萬死而不辭（中）	207
身在“曹營”心在“漢”，萬死而不辭（下）	210
蒼天可鑒：他成了“黨外人士”	216
蒼天可鑒：他成了“黨的敵人”	218
蒼天可鑒：他被抓進了“黨的監獄”	224
蒼天可鑒：他被黨判了無期徒刑	226
無期徒刑只住了十八年監獄；出獄時，他已成了近乎雙目失明的孤寡老人	229
政治的瘋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涼	233
“患難時，我們認識朋友！”	238
上訪“黨員之家”的中組部，他感到春風撲面，的確換了人間；	
但人民大學還在鬧“倒春寒”	241
胡耀邦家的門前所見和胡耀邦的批示，使他增添了無限信心	244
“倒春寒”畢竟只是春天中的短暫寒冷，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	
終被全部推倒	247
他終於以一個紅色革命者的本來面貌，度過了他最後的歲月	255

第 10 章 延續二十八年的“伊瑪尼黨”大冤案的徹底平復262

革命節骨眼兒的一封“檢舉信”	262
不是“伊瑪尼黨核心”，而是一個崇尚正義的回民大家庭	263
“族字三號案”——丁點兒真憑實據也沒有	271
廬山會議後炸了丁鐵石，罪名還是“胡亂湊”	284
一連串的不定時炸彈連續爆炸，多少人受盡屈辱，命喪黃泉	291
硬要把閃光的歷史翻成一本黑賬，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	297
胡耀邦的一個批示，“伊瑪尼黨”這個大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	308

第 11 章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獲救 318

第 12 章 福建地下黨冤錯案的最後解決.....335

這些冤錯案的由來.....	335
胡耀邦說：應該公正地解決這個難題.....	337
胡耀邦再作批示：抓緊進一步解決.....	342
真是“快刀斬亂麻”.....	346

第 13 章 李之璉與溫濟澤之再見天日錄.....349

李之璉與周揚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	349
黨“八大”代表李之璉，邊參加“八大”二次會議邊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難路.....	358
溫濟澤之被補“右”就簡單多了：只因轉達了有關周揚的一個說法.....	365
李、溫二位各自走了漫長的坎坷路.....	370
一群雄雞唱天白 是是非非終分明.....	378

初版文後補言.....	388
-------------	-----

附錄

勇敢的義舉 勇敢的創作.....	張黎群	396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邵燕祥	398
歷史不容遺忘.....	季音	401
讀《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王大庭	403
讀《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史真	407
讀戴煌先生大著.....	張文達	409
反“左”先鋒胡耀邦.....	文翎	411
歷史會記住他的良知.....	關夕芝	413

新版序

1997年9月，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出了本書的繁體字本第一版，1998年2月再版；同年5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和新華出版社在大陸出了本書簡體字本第一版，2004年7月，中國工人出版社又出了簡體字本的第二版；現在三聯書店和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又將推出第三版。

這樣一本書，為甚麼能夠在香港和大陸十幾年來連續出版許多次？我想，這與胡耀邦在“文革”結束後的正確作為分不開。因為這個人一貫虔誠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與那種假藉“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坐江山”的人完全不同。他倡導的“真理標準”——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真正能夠彪炳青史，為數以千萬計冤苦民眾解除苦難的巨功偉業。建國後近三十年，不理會實踐的結果只空洞地大喊高唱“偉大”的高調調，已將中華民族帶進了悲苦的深淵。

1944年春天，我剛過16歲就參加了新四軍，並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的軍隊和黨內的最響亮的口號，就是力爭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共產主義天下。但從建國初起直到文化大革命，連續出現了大量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使中國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時，是胡耀邦以“兩個不管”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神話，大力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他本人也因此成為被人民懷念至今的總書記。

戴 煌

2012年9月26日下午
於新華社宿舍

修訂版序

李銳

十四年前，耀邦病逝，舉國同悲。1998 年，戴煌同志這本書由首都兩家出版社共同推出，首印十五萬冊，大受讀者歡迎，今又得以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再出修訂版，可喜可賀。

上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胡耀邦主持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進入新時期的前奏。當時，不跨過這道門檻，改革開放無從談起。從 50 年代到 70 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先後發生過鎮反、肅反、反右派、反右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直到十年“文革”浩劫，冤案如山，受到迫害和株連的幹部、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數以萬計。胡耀邦從擔任中組部部長起，就以超人的膽識，將過去的冤案昭雪，從而驅散了長期籠罩在億萬中國人心中的陰雲，四海同歡，天下歸心。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後，力主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領域全面改革，絕不讓再製造新的冤案。

我曾經講過，中國共產黨出現胡耀邦，是歷史的安慰。他出身貧苦，只讀了半年初中，就參加了紅軍。在反 AB 團事件中險些被殺。在漫長的烽火年月中，他用心讀書，勤於寫作，親近知識分子，如陸定一所說，他成為一個大知識分子。當歷史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他殫精竭慮，作風民主，至今海內外的中國人，提到他的名字，無不懷著由衷的敬意。

耀邦去世時，我在悼詩中說過：活在人心便永生。誰還會懷疑呢？耀邦會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3 年 11 月 26 日

修訂版文前絮語

199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辭世十週年。當日，九十四高齡不得不以輪椅代步的呂正操老將軍，在耀邦長子胡德平和次子劉湖夫婦的陪同下，斷續攀登共有103級台階至耀邦陵園墓碑前，虔誠謁祭。當月下旬，耀邦夫人李昭大姐又率領包括本人夫婦在內的眾多人士等，拜謁了耀邦陵園。

據陵園工作人員和《胡耀邦陵園》上的簡介稱：陵園位於江西省省會南昌市至北臨長江的九江市之間共青城附近的富華山。它原名富陽山，是李昭大姐為其改的名，它“東瞰鄱湖，西枕原隰，青山碧水，鏡靈毓秀”；“陵園墓碑高4.43米，底邊長10米，重73噸，長三角形花崗石碑雕刻著中國少先隊隊徽、中國共青團團徽、中國共產黨黨徽，右上方耀邦同志肖像栩栩如生。墨晶玉花崗岩鐫刻著耀邦同志生平”。陵園入口處，有一座肖克老將軍題字的富華亭，一派“鮮花翠柏慰英靈，青山綠水伴忠魂”的壯美人寰。

據介紹：1990年3月15日，共青城的同志們動工修建此園，僅九個月，即當年12月15日便大功告成。當日，在時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溫家寶等人的陪護下，胡德平敬捧其父的骨灰盒安葬於陵園。在隆重的安葬儀式上，李昭大姐發表了講話，動人感人。

陵園工作人員說，陵園向全國各界人士開放後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即1991年和1992年，朱鎔基同志就接連兩次來訪。此後，據粗略統計，近幾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國務院組成人員、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負責人及軍隊等各界著名人士，先後前來晉謁者有：李瑞環、胡錦濤、喬石、江澤

民(偕夫人王治平)、宋平、田紀雲、胡啟立、李鐵映、吳官正、曾慶紅、宋健、布赫、錢偉長、雷潔瓊、李德生、廖漢生、張震、白紀年、榮高棠、朱伯儒、張海迪、蔡振華等。其中，有人多次前來拜謁，田紀雲、李瑞環更深拜號陶。

陵園紀念館的同志說，至1999年4月，耀邦同志骨灰安葬以來的八年零四個月中，全國各地前來瞻仰的人已有二百多萬，平均每年都有三十萬人左右。這正是為官清廉、剛正不阿、不知倦苦地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偉大人格感召力之恆勵永存。一切崇尚人間正義的人，絕不會淡忘這位為國為民實現真正偉大共產主義理念奮鬥終生並做出了巨大奉獻的偉大戰士。

共青城所屬一個局的團委書記曾對我說：每登富華山瞻拜耀邦同志，就覺得一位崇高的平民偉人形象矗立在自己的眼前，心靈立刻又被淨化昇華了一次，深感自己有時偏念一己之得失而頓顯委瑣與渺小。

他說：千古流傳“萬里長城今猶在，只是不見秦始皇”，這說明任何人總有西歸的那一天，就看他給這個世界上留下了甚麼。耀邦同志亮節高風、誠仁至德，在人民的心中是永遠不會被磨滅的。

這位同志所言當即使我想起，朱鎔基同志常常引用的一段古訓以自勵的那段話——“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廉生威”，廉而公才是偉大人格力量之源泉。

1999年4月26日上午，我們隨著李昭大姐等多人攀登陵園，敬獻了兩大排從百里外南昌特購的鮮碧高大花籃。其中，也有本人誠踐囑託，為前輩與友人李銳、張思之、邵燕祥謝文秀夫婦、杜導正——方實暨《炎黃春秋》雜誌同仁、蕭蔚彬暨《同舟共進》雜誌同仁、方方女士暨《今日名流》雜誌同仁一一敬獻的花籃。

祭謁禮畢，我們夫婦與一些友人也到碑後一側，恭立於李昭大姐揮毫

灑題的巨石兩旁攝影留念，對那“光明磊落無私無愧”八個大字，刻骨難忘。

此行我多方搜集素材，擬寫《耀邦十年祭》文，但返京後發覺必須立即開刀，截腸尺餘，化療一年，此擬空落。如今在本書修訂版即將面世之際，只能匆匆綴此絮語，並抄錄戊寅年（1998）參加“湘鄂贛三名樓（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文學筆會”並留筆於共青城歷史館的湖南龍長吟的一首律詩，與崇尚正義者共吟之——

十三旌旗捲紅纓，萬里江山血鑄成；
身披羅霄風煙緊，手托共青建新城。
心憂國事曾拍案，魂歸雲天世人驚；
富華有幸護忠骨，蕩盡妖孽慶太平。

戴 煌

2003 年初冬斷續補記於小恙中

初版序

李銳

耀邦同志離開我們八年多了。古今中外，大凡對歷史進步做過卓越貢獻的人，總是為後人永遠思念的。胡耀邦自不例外。

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當代歷史要揭開新的一頁，仍有兩大難題待解決，即“兩個凡是”和如山冤案。不批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思想路，不解放成千上萬被定為“反革命”、“反黨分子”的新老幹部，自不可能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這兩大難題都牽涉到毛澤東，都同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及實踐密切相關。解決這兩大難題，需要何等的膽識，何等的魅力與毅力。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是曾經將中國革命從錯誤路 和瀕於失敗中挽救過來的偉大領袖；文化大革命中，全黨全民更是唱了十年《大海航行靠舵手》。因此，要徹底改變幾十年來根深蒂固“左”的路，是一場旋乾轉坤的搏戰，是當代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眾所周知，為這場搏戰，這場革命打先鋒的是胡耀邦。當時，他先後在宣傳和組織領導崗位上，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辦好了這兩件大事。

耀邦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時，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抵制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中央一、二、三專案辦的檔案材料。這是一種何等困難、何等嚴峻的局面。耀邦勇敢地另起爐灶，對大小案件，由中央組織部單獨進行調查，一一落實，取得成功。他常不分晝夜，親自接見上訪人員，幹部不分高低，一視同仁。這是一場硬仗，不打好這一仗，不平反所有的冤假錯

案，不解放從中央到地方各條戰線的幹部，請問十年“文革”造成的“崩潰邊沿”的局勢，如何扭轉？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長文章，如何開篇？

這樣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是我們黨歷史上的創舉。我們黨“左”的“肅反政策”，由來已久。從江西時期打“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等等，到延安的“搶救運動”，一直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開國之後，“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直到“文革”十年，到處“敵人”，遍地冤獄。回顧這一頁漫長的慘苦歷史，令人痛心不已。“文革”十年，製造冤假錯案登峰造極之後，才痛定思痛絕路逢生，我們黨終於大徹大悟，不再搞運動、大規模整人了，不再重蹈覆轍了；從此才出現人心舒暢、人才輩出的新氣象。

關於胡耀邦這一打先鋒的歷史功勳，有切身體會的老記者戴煌，將之寫成一本三十多萬言的書《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他經過多年採訪和積累材料，細心縷析，使這部書內容翔實，生動感人。書中各章節已陸續在幾十家報刊發表，贏得廣大讀者的讚許。現在結集出版，這確實是為當代中國歷史做了一件大好事。

1997年5月16日

初版文前短語

胡耀邦同志離開我們已六年多了！

今年 11 月 20 日，是他的八十誕辰；12 月 1 日，是他安葬於江西共青城
的五週年，於眾於己，我都應著此文以為念。

透過歷史的迷霧，許多志士仁人樸實無華而激人奮進的箴言錚錚在耳。
其中 20 世紀 70 年代行將結束的時候，在飽經憂患的中國大地上發出的、
最震撼人心又鮮為人知的一句話，我認為就是胡耀邦為解救億萬人跳出苦
海，統率中國共產黨內一群群慷慨悲歌之士，奮勇衝向“兩個凡是”堡壘時
的大聲吶喊——“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在那艱苦卓絕的數百個日日
夜夜，他們就從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鍋”中，搶救出千百萬快被炸透了的
苦難者。這些苦難者的數以億計的親屬，也隨之擺脫了含冤蒙垢的歷史重
負。更多的中國人，也不再噩夢連連，而放心大膽地向原定目標疾步前行。

本文所寫，正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各種文獻中，一再肯定但
遠未盡為人知的這段往事，和許多人腦海中彌足珍貴的記憶。正如歌德所
說，“我要做的事，不過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種的莊稼而已”。

戴 煌

1995 年 6 月 24 日

於戴氏蝸牛居

第一部分

第 1 章

一次大解救

“全國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黨校主持校務的副校長胡耀邦，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到任沒幾天，他就問中央組織部過去問過“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國究竟有多少‘右派’？”

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這個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從未整過人，並對所有被冤整過的人滿懷同情。

1932年，他十六歲，在中央蘇區湘贛省委負責兒童工作時，被稱為“AB團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書記馮文彬及時而巧妙地解救，他險乎英才早喪。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搶救運動”的漩渦，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連。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邊的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回憶“AB團”往事時說：我那時還小，受到那麼大的打擊實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時我比較胖，人們都叫我“小胖子”；但從那之後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現在也沒再胖起來！

具有充分說服力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了，所謂的共產黨內也有“AB團”和延安“特務如毛”、必須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搶救運動”等等，都是殺人連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斷出來的。

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和這一齣齣自相殘害的歷史悲劇，促使耀邦早就

暗立誓言：永生永世絕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這樣幹！

1956年7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召開了一千多人參加的“肅反運動”總結大會。作總結報告的，是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劉西元。當劉西元講到“肅清反革命”的曲折過程時，坐在台上報告人後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擠到話筒前說：“這次‘肅反’，傷害了一些好同志……”，邊說邊接過一旁秘書遞過來的一張名單，大聲念了起來，第一位就是《中國青年報》編輯朱志炎（這位復旦大學畢業生，為20世紀80年代初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編譯出版者）。念完了名單，耀邦接著說：“這是書記處的責任，首先是我的責任，是我的失誤，因為我是第一書記……我要向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們，對不起了！”說罷，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並連說：“對不起，對不起……”

1957年整風鳴放，《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在首都新聞界座談會上，就如何辦好一份為青年所喜聞樂見的報紙為主題，作了一個包含五個問題的發言。他說青年報應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甚麼文件講話都照抄照登，而應當精細加工，使其生動活潑，形象具體，不要將報紙弄成個“佈告牌”、“留聲機”、“翻版書”。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把他的這些話見了報，全文被載入人民大學新聞系講義。

當時人們都不把這當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計劃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去伊朗等國訪問。在接著到來的“反擊右派猖狂進攻”時，團中央的“反右”鬥爭由書記處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羅毅全權領導。他東一榔頭西一棒地在團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張黎群的那句話也被抓住不放，並被密報到黨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從國外一回到烏魯木齊，就給北京的羅毅打電話，詢問團中央的“反右”鬥爭情況。當他得知光是《中國青年報》編輯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約佔編輯部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總編輯、部主任和業務骨幹時，十分震驚而沉痛地說：“損失慘重啊！”他立即趕回北京，想出種種辦法挽救和保護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說：“張黎群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講的那些詞句，是糊塗俏皮話。他是說報紙登的通知，講話甚麼的太多了，好像是貼佈告，說了句俏皮話。他很年輕時就參加了革命，對黨還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當有些報紙猛批張黎群的那些用詞時，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就把張黎群的整個發言稿調去看過了，還在小平面前為張黎群說了不少好話，並拍了胸脯打保票說：“此君絕不會反黨！”現在又聽到耀邦也是這麼說，小平說：“那就算了吧！不過他既然糊塗，就不能再當報紙總編輯了！”於是張黎群的問題就成了人民內部矛盾，被定為“犯了具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嚴重的政治錯誤”，給予四個方面的處分：寫一篇檢討文章，由新華社發通稿，供各報刊登，以消除錯誤影響；撤銷共青團中央常委；黨內嚴重警告；下放陝北米脂縣擔任縣委書記處書記。

但是不管怎樣，耀邦總算從“敵我”分界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還針對上述四條處分，來了個四條保護措施——在1958年8月舉行的團中央三屆三中全會時，當面對張黎群說：“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為止了；處分決定不登報；保留黨的‘八大’代表資格；不當常委可仍是團中央委員；不是一般的‘下放’幹部，而是真正有職有權的縣委書記處書記。到了那裡要認真研究如何改變老根據地的貧窮面貌。這是新擔子、重擔子啊，務必得挑好！”

張黎群臨離北京時特向耀邦告別。耀邦又叮囑他說：“黨員犯錯誤是難免的。你看在延安辦輕騎隊的許立群，那時有人說他犯了大錯誤，而今還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萬不要沒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應該昂首挺胸，回到老區米脂縣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遺憾的是，他雖然也做過了種種努力，結果未能把《中國青年報》的副總編輯鍾沛璋、陳模等同志和團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從“敵我”上救回來。但是他對這些同志從不歧視冷落。有人登門求見，只要有空，他都親切接待。

當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裝，即將去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李順達的故鄉——山西平順縣接受考驗的時候，他又把他們請到團中央二樓會議室，對他們作了近兩個小時的講話。他說：“我要給你們講兩點：第一，你們所犯錯誤的性質十分嚴重；第二，你們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對於第一點，他沒有再說第二句，而對第二點，卻似清泉滔滔地講了許多。他說在黨號召整風時說了幾句過頭話，並不能表明就是反黨。《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幹部，絕大部分來自大學，而且是參加過地下工作、學生運動的優秀分子，或是地方團委及地方青年報的比較優秀的幹部。他們都對黨深有感情、工作積極、擁護社會主義，思想也都比較活躍。

最後，耀邦對這些同志說：“你們都還年輕，有文化、有能力，過去都為黨為青年團做了許多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我深信，你們下到農村後，必定會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為改天換地建立新的業績，在將來的某一天，你們還有可能重新回到黨的懷抱……”

耀邦的這番真摯動情的講話，對這些被推到“敵我”上的人們是個強有力的激勵，不少人聽得直掉淚：“耀邦還是把我們當作自己人的呀！……”

這些同志去了平順後，都沒有辜負耀邦的殷切期待。只兩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溝溝裡的村幹部和老鄉，還把許多人評為模範幹部，他們都婉言謝絕，說他們是下來鍛煉的，不參加當地幹部、社員的評比。他們回到了團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陳模、鍾沛璋回到了《中國青年報》，雖然沒有恢復副總編，但都當上了青年活動部和知識部的副主任，不僅讓他們編稿、發稿，還可以照樣撰寫評論和社論。

“反右派”鬥爭結束，耀邦把各單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個一個地請到自己家裡或辦公室談心：“你們哪是甚麼‘右派’，多半是驕傲自滿，說話欠考慮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喪志，自暴自棄”。

他深切關懷的當然不僅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團中央書記處一次擴大會議上，書記處書記項南、梁步庭等同志，強調共青團要充分發揚民主，密切聯繫群眾，並提出了一個包括民主化、群眾化、自治化的“十點建議”。對這個建議，大家都表示贊成，並下發各省市黨委和團委，請他們參照執行。

1958年夏，黨中央某些同志以檢查黨的領導為由，先把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打成“反黨分子”；開除了他的黨籍，接著又要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他們實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辮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項南、梁步庭的“十點建議”作為“毒草”來大批特批，連續召開了七十三天的批判會，終於給“十點建議”定了性，說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綱領”，“攻擊黨的領導”，“篡改青年運動的共產主義方向”。會議定項南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農村勞動；梁步庭也受了處分。

其後多少年，耀邦一直為沒能保護好這些敢於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內疚。他決心要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組部的前一個月，在他指導下撰寫的有關落實幹部政策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他特別建議執筆者加了這樣一段話：

“需要特別指出：對那些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對象，應當真正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讓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出力效勞……”

這就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開委婉地埋下了伏筆。

“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

1978年春天，專為解決“右派”這個大難題的會議將在山東煙台舉行。會議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牽頭，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處理“右派”的遺留問題。

按當時已經掌握的資料統計，全國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約四十五萬餘人，從1959年建國十週年開始到1964年，先後摘去五

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萬人，尚有十多萬人必須全部摘掉帽子，並連同過去已經摘去帽子的都應給予妥善安置。

耀邦預計，由於世人不會很快完全擺脫“左”的束縛，這次會議很可能發生激烈爭論。他特地委派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和陳文煒出席會議。

不出耀邦所料，“煙台會議”上果然發生了原則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組的指導思想，就打上了“兩個凡是”的烙印。小組的主要負責人認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後，不再叫他們“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視他們；但不搞甄別平反，只對極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可以作為個別人的問題予以實事求是的改正。

中組部的楊士傑、陳文煒等人則表示不以為然。

在閉幕總結會議上，楊士傑又特別就“右派”的改正與安置問題講了話。他說：“反右”運動已過去二十年了。今天我們對待“右派”的改正問題，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說只有“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可以改正，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錯多少改多少。

為使這一講話更有力，楊士傑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剛進中組部時說的一句話——“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下，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楊士傑說，同時也不能因為我們工作上的疏漏，使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得不到理所應當的解決。楊士傑還特別強調地說，當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許多都是學有所成、有所建樹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不但是我們黨的財富，更是全社會的財富。對他們改正和摘帽後的安置，不能單純地只就其生活問題就地安置，而應當通過妥善安置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被強抑已久的聰明才智，為國家的四個現代化作出新的貢獻。

可在當時，與會的許多人還沒有覺悟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們還習慣於“句句是真理”，因而楊士傑的發言立刻炸了鍋，連採訪會議的記者也分成了兩大派：《人民日報》記者于國厚完全同意楊士傑和中組部其他同志的意見，而另一個特大新聞單位的記者則認為楊士傑等人是“兩面

派”。於是，會議仍以牽頭的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名義，向黨中央擬了一個《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不久，中共中央把這個報告列為1978年的“十一號”文件，轉發全國遵照執行。

不過在“煙台會議”結束時，楊士傑和公安部副部長凌雲等人曾表示對這個報告持有“保留意見”。

《人民日報》記者于國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報社國內政治宣傳部主任王澤民、副主任付真彙報了會議上的爭論。王澤民、付真與報社領導胡績偉、安崗等人火速商量後，給楊士傑打了電話，表示對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們的主張，不能僅僅“保留意見”，而最好正式寫出書面材料送出去，繼續據理力爭。

接著，在中組部老幹部黨支部成員袁任遠家裡，陳文煒與王澤民碰了面。他們知道許多老同志都認為“煙台會議”沒有真正地解決問題，必須向中央反映會議真實情況，並當即談妥，由陳文煒以會議參加者身份寫一個書面反映。陳文煒回到中組部寫好後，送請楊士傑過目，楊士傑簽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煙台會議”主要牽頭者的統戰部。統戰部有關人員看了這份材料，一再詢問中組部送材料的同志：這是楊士傑的個人觀點，還是中組部的意見？

送信人回來向陳文煒轉述了統戰部人員的詢問，陳文煒說：“楊士傑是中央組織部的副部長，他不代表中組部還能代表誰？”但為慎重起見，陳文煒與楊士傑專門向耀邦作了彙報。耀邦看了陳文煒書面反映的副本當即表示：“我完全贊成！”事後，耀邦又讓中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組部的名義，直接給中央寫了個報告，並把1957年10月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找了出來一道附了上去，請中央重新定斷。

報告送了上去遲遲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讓楊士傑給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打電話問一問。斷斷續續地催問了三個月，終於催來了回音：還是“煙台會議”的五大部再次開會，研究“右派”的改正問題。

這次會議沒有再去煙台，也沒去青島、北戴河、大連、哈爾濱等涼快地兒，而就在西單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飯店，又省時間又省錢。不過，當五大部的人馬在那兒聚攏時，竟又發生了一場口舌戰。堅持“單純摘帽論”的同志說：過去的是是非非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再一一清賬了；今天只要統統摘去帽子，都當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夠可以的了。

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在會上說，如果把幾十萬“右派”都“改”了過來，全黨不就忙得亂套了嗎？

統戰部的又一位副部長在會下說，不管怎麼著，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總得留下一些“樣板”，不能都改了。

針對這些很坦率的議論，楊士傑拿著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樣十分坦率地在會上說：黨的歷史上也曾經為一些冤假錯案平過反、糾過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強了團結，促進了革命事業的發展，還從未聽說過“亂了套”……

終於，楊士傑的這一席話，得到了“五人小組”領導成員——統戰部長烏蘭夫、公安部長趙蒼璧、中宣部長張平化、民政部長程子華等人的認同。這些部長一致表示：贊成士傑同志的意見。楊士傑高興得立即給在中組部專候佳音的陳文煒打電話——“問題解決了，解決了！”陳文煒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問題解決啦，‘右派改正’問題解決啦……”一位老幹部應聲舉起了雙手——“我舉雙手擁護！”耀邦聞聲更笑呵呵地說——“這就好，這就好！”於是，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擬出了《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中央於1978年9月17日以當年“五十五號文件”向全黨轉發了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與五個月前轉發的“煙台會議”方案相比，有了明顯的不同：它不但對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做了進一步的規定，同時做出了“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的明確規定，而且特別增加了“關於改正問題”的一段話：“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

譽，由改正的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生活有困難的，給予必要的補助”；“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等等。

消息傳出，全國人心為之大振。緊接著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統籌建議下，新華社發佈了《全國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報》配發了《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的社論。

未幾，以“右派”改正為中心議題，《人民日報》發表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品質與氣魄》的評論員文章；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公安部錯劃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隨之中央黨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錯劃“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紛紛見諸報端。

有些省市負責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紛紛給《人民日報》打電話探問這是咋回事。胡績偉一一回答說：專政機關和中央黨校的“右派”都平了，別處的“右派”更該平。因此，《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曾特別強調：“中央黨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的改正工作所以進展較快，是由於他們對這項工作有正確認識，有較強的黨性和政策觀點，對那些負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但有些地區的有關部門，面對這項重要工作，猶猶豫豫，搖搖晃晃，至今不敢切實抓起來。這樣的精神狀態同當前的大好形勢是不適應的。要辦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個人力、每一分時間，盡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把這項工作做好，從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事業上去。”

無疑，這不啻於快馬加鞭。全國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強旋風。據過去中央有關部門在全國公職人員中的統計，“揭發出右派”大約四十五萬人；而此刻經認真查實，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萬大關。

有人有點慌了：“這怎麼辦？太多了！”胡耀邦說：“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麼不嫌多？”

又有人說：“有些人是毛主席點了名的。”胡耀邦說：“毛主席說錯了的

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實事求是？”

一個工業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錯劃為“右派”的總工程師留做“樣板”不可。楊士傑聞訊，批評這個政治部的負責人說：“難道你們也想唱一台‘樣板戲’？！”

這樣，這位總工程師才被解救了出來。

這一次大解救，就使數百萬人脫離苦海

筆者本人，也是在這場大解救中被解救出來的一個。

我是在1957年所謂的“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之後，在“繼續幫助黨整風”的黨內座談會上，因提出反對“神化和特權”而被打成“右派”的。新華社曾為此發了長篇報道，刊於全國各大報。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時作了轉播，港台一些報紙更大肆渲染，台灣新聞界還發了廣播，“歡迎”本人到台灣去。

1978年元旦前後，當胡耀邦把搶救“右派”當作重大戰略舉措即將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年整半百的我還是公安部門嚴管下的一名“二勞改”，在山西太原東南郊狄（仁傑）村附近四周拉滿了電網鐵絲網的大場子裡，飛車猛推燒磚土。

突然，左車輪被一根脫位的車輻條卡住，隨著右車輪的繼續飛滾，小車把兒向右猛拐而“打”斷了我的左肋骨。

這是我被打成“右派”後，第三次被打斷左肋骨。輕輕地說話或咳嗽都鑽心的疼。

當然，在從北大荒到北京郊區的四處監獄，從天津、唐山間的茶淀勞改農場到山西太原的勞改建築工程隊，這長達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這種痛楚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壓傷過小腿，被木炭窯中的煙火熏得暈死過。在常年飢餓的難友們不時倒斃於田間、路邊、工地的時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條褲衩的淨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

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電鋸、斧頭、刨刀傷過手指頭，血流如注。

正當又被小車把兒打斷肋骨的時候，接到北京來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終於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廠的一些人對她的長達十幾年的株連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飛越重重關山到北京，飛到她的病床邊。但是儘管我身背“右派”惡名，被懲罰了足夠培育一代人的漫長歲月，我仍然沒能獲得這人世間最起碼的自由權，而只能在黑的似無盡頭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歷史唯物地說，這條黑暗漫長隧道的那一頭，也曾豁然閃亮過湧入新鮮空氣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鄧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時候。那時儘管天際已經湧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陣陣烏雲，他仍然爭分奪秒地爭來了一道緊急令：讓全國所有在押的數以萬計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立刻寬釋出獄或脫離勞改場所，去社會就業或回故地養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勞改建築工程隊一些滿圍著電網鐵絲網的場子裡和大院裡，立刻就有這樣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捲，提著內裝面盆飯盒等雜物的舊網兜或破紙箱，迅速離開這個並不令人留戀的所在地揚長而去。

這一度給我帶來了莫大希冀：既然我們黨的最高司令部，對原本與我們勢不兩立的營壘中的縣團級以上人員都施以如此禮遇，那麼對同樣在押的我們自己隊伍中縣團級以上人員的寬厚，肯定也為時不遠了。

但是，當人們眼看著陣陣風雲的迅速變幻，毛澤東剛剛離世就把那四隻螃蟹燒上鐵鏊的時候，空中響徹雲霄的吼聲仍是“千萬不能放鬆階級鬥爭這個綱”；“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那麼既然是毛澤東拍板的“反右派”鬥爭，當然也只能“按過去方針辦”！於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沒法忍受這茫茫黑暗的擠壓。因為我的最大“罪過”，只不過是1957年響應黨的召喚，說了一些真心話。即使改“言者無罪”為“有罪”，對我的懲罰也早就過頭十萬八千里了。因為一宣佈開除我的黨籍軍籍，每月只給二十八元生活費並被發配去北大荒監督勞動，當年同是新四軍一員的妻

子就立即與我劃清界 而別，剛會叫第一個單字“爸”的十個月的小女兒改名換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結核一直靠我的濟助維持生命的唯一的姐姐，由於濟助突然中斷，不到兩個月，就離開了人世；蘇北故土所有的侄兒侄女，即使學習成績再好，體格再健壯，也不能申請入黨入團或報名應徵入伍。一個年僅二十、又是一名小學代課教師的侄兒，患心臟二尖瓣狹窄症，只需人民幣二百元動一次並不複雜的手術，就可挽救他的一條命，但是我們一大家子都窮得叮嚀響，當地政府又不願為這個“右派”的侄兒而擠出招待上峰吃頓飯的這點兒錢，就看著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鄉小鎮也對省委書記江渭清等人召開背靠背的批判會。主持會的小鎮幹部，硬讓我的五十開外的二哥戴作霖領頭喊口號。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沒安好心：因為他“好話已說盡，壞事都有份”，對秉性耿直的人都視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釘。我的二哥說：“門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說“沒關係，大家會聽出個意思跟著喊的”，硬把一張“口號單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實在推不過，只得帶頭喊。“打倒江渭清”的這一句剛出口，這個會議主持人立刻宣佈大會要轉換方向，批鬥“現行反革命”。因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前，帶頭呼喊打倒我們的偉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號”；“因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對黨懷有刻骨仇恨，這是明目張膽的報復”。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寫好“現行反革命”五個大字的大鐵牌，掛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強迫他三步一跪地遊街示眾。那細鐵絲吊著的大鐵牌好幾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沒出幾十米，細鐵絲就勒破了脖頸，鮮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絕症飲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沒能回去為他送別。由於同樣的羈絆，我的老母親辭世時，我也未能最後見她老人家一面……

這是任何一個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難以忍受的傷痛！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讓我們這種人繼續在這無盡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斷，我的第二個妻子身患難治之症的時候。

她比我年輕整整一輪。當我從北大荒經過兩年零八個月的監督勞動回到北京的時候，儘管她還是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姑娘，但她認為我並非“壞人”，而甘願與我苦伴終身。由此她被人稱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極端反動”，受盡了人間罕見的磨難。現在她像一隻屢中毒箭的母雁，帶著兩隻羽毛未豐的雛雁，跌落在冷酷無垠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誰去？！

經說明情由，那個四周圈滿電網鐵絲網的大場子裡，一位從華東政法學院畢業的、頗有理智的管教幹事邢鳳舞，給我開了綠燈。我回到了北京西單又一順飯莊後面一座貧民窟小院裡：一間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陰冷而潮濕。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著我，似乎我是個她從未謀過面的陌生客。兩個女孩都穿著打著補丁的舊棉襖，兩眼汪汪地直流淚。我早聽說，儘管她們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只因為她們的父親是個“大右派”，就一直當不了紅小兵。諸如此類的絕情悖理之為，與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這說明在粉碎了“四人幫”之後，亟須一輪紅日噴薄而出，才能最後驅散漫漫長夜結束前的黑暗。

後來在為解除妻兒苦痛而奔忙時才耳聞：一批真正的共產黨人正在鼎力托舉這輪紅日，領頭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號文件”下發不久，我就得到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徐文當面通知：“國慶節後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後兩個月零十二天，我們黨又一次重大歷史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正式揭幕，新華社黨組（當時稱“核心領導小組”）就批准了國內新聞編輯部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內的所謂“反黨右派小集團”全體成員，以及原國內新聞編輯部副主任莊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報告，並召開了相當隆重的平反大會。

特別令人感奮的是，在平反大會前，新華社領導就讓我以新華社記者、共產黨員身份重操舊業，並與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多次談話，為昭雪“六十一個人”的大冤案廣泛搜集寫作資料。在平反大會前後，特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自己經手編發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

假錯案的稿件，這是在漫無盡頭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斷肋骨、回到癡愣愣地瞪著我的妻子床前時，萬萬未曾料到會這樣迅速展現的美好現實。

後來由於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達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佔1957年國家幹部總數九百五十三萬人的百分之五點八，大大超過了毛澤東常說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況這還不包括留下做“樣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原屬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等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據估計，這樣的“右派”不下十萬人。此外，還有數以萬計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內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親友眾多。自我被打成“右派”並被全國各大報根據新華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後，他們受到株連迫害、歧視，一直抬不起頭的多達百人以上。許多“右派”的家庭成員和親友，也許沒有這麼多人。但僅以十人計，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組織部的有關同志的這場大解救，至少使全國不下六百萬人從黑暗深淵中飛躍而出，重見天日。

同時還得知這場大解救，並非是胡耀邦們以“下油鍋”的精神取得的唯一勝利，而只是一系列勝利的一個，其功德之廣，無可量及！

“我向陳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又為迅速解決一直使他深感內疚的項南的不幸遭遇，給中組部副部長陳野蘋等人寫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蘋同志並幹審局、經濟局：

我認為1958—1959年團中央對項南同志的處分是過大的，不恰當的，是應該撤銷的。對他的處分決定，因為發給了全國，撤銷時，也應相應地發下去。至於

責任問題，我當時是團中央第一書記，理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應如何甄別撤銷，因為時間已久，我對許多情節記不清楚了，你們辦起來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見是：先找到當時的決定起草人、經手人，同項南同志一起，先寫出一個甄別撤銷草稿，由當時團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常委（我、劉西元、胡克實、王偉等人）共同寫個意見，然後做出決定。此事，請你們一定抽出二三個同志辦一下（可以說是幫幫我的忙，因為這一案辦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 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團中央為項南平反的報告，並指出項南當年為提高共青團的戰鬥力的主張，其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積極的、是建設性的意見，不是“右傾機會主義綱領”；這是一個錯案，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不久，項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書記。梁步庭後來也由青海調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這時，對項、梁往事，耀邦才漸感寬懷。

在這之前，即1979年2月，團中央在西苑飯店召開共青團省、市委書記聯席會議。陳模也被邀請到會。在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為“右派改正”問題爭論不休的“煙台會議”結束之後，陳模曾給耀邦一信，要求幫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給他回信說，現在中央五個部對“改正右派”問題的意見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問題一時還難以實現。他提議暫時先解決重新入黨問題，然後再進而謀之。陳模向機關黨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黨的黨員，不能只來個重新入黨。機關黨委說，為了方便工作，這只是個臨時變通辦法嘛！陳模說那得允許他保留日後要求平反錯案的意見。機關黨委表示同意，於是黨支部一致通過陳模重新入黨。第二天，他就被宣佈為中國青年出版社黨組副書記，兼任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不久，“民族飯店會議”結束，陳模和團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徹底改正。這一次，陳模就是以上述黨組副書記、社長和總編輯身份應邀出席團省、市委書記會議的。

會議的第一天大家入場時，陳模一進門就在後排找了個空位坐下。耀邦進

場時，一眼就瞅見了陳模，連忙微笑著走過去與陳模緊緊地握手，詢問陳模的工作和身體近況，邊說邊拉著陳模的手向會場的前面走去，讓陳模在面對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座。隨後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著陳模對全體與會者說：

在我們團的高級幹部中，誰吃的苦頭最多呢？就是陳模。團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陳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這件事情我是有責任的，因為我是第一書記，也是簽了字的嘛！我向陳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說著，他向陳模連著三鞠躬，接著又向整個會場連著三鞠躬。這使得陳模又一次熱淚盈眶：團中央當年打“右派”時，明明耀邦在國外訪問嘛；他回國後，想方設法要保護挽救我們這些人的嘛！最後實在無可奈何，他被迫規定簽了字，現在卻要代他人承擔這個責任，天下還有這樣的好人？！

耀邦已進入會議主題正式開講了，陳模邊做筆記邊不時地擦眼淚。

單單是對“右”字號人物的關懷與解救，耀邦的這類故事就多了。作家從維熙也對筆者說過，1978年“煙台會議”與“民族飯店會議”之間，他正在西安電影製片廠寫電影劇本，曾給耀邦寫了一封信，訴說了自己“反右”落難後的遭遇，並言明他不會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請徑直寄到東四北大街一條小胡同他老母親的住處。當他數月後回到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內低於門外地面的陋室時，一封發自“中共中央組織部”並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鉛筆，寫了滿滿兩張紙。內中說到王蒙等人給他的信也收到了。“你們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經受了考驗和磨煉。沒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並相信你們都會不斷寫出催人上進的好作品來……”

這封回信，成了從維熙的筆尖源源流出優美亢奮文字的重大加速力。